

Lucie Hsu

朱子家著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一冊

春秋雜誌社印行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一冊)

朱子家著

春秋雜誌社印行

自序

對日抗戰時期，由汪精衛所領導而在淪陷區建立的一個政權，當其存在的時候，人們對它有過那樣多的揣測；於其覆亡以後，仍然會有那樣多的傳說。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政權，會像它那樣給予世人以如此不確定的觀念！到今天爲止，這政權已經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體早因成敗而蓋棺論定，但留駐在人們心理的一項微妙感，似乎並不會完全祛除。

當兩年前姚勵頗兄創刊春秋雜誌時，認爲汪政權不論其本質如何，目的如何，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不管是讓後人齒冷；或者是供後人嘆息。而戰後尙無人比較完整地寫過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寫此中事，爲讀者打破這一個謎樣的疑團。我卻不過他的盛意；事前也來不及作一個寫作的準備，糊裏糊塗就寫好了第一節交給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後，纔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個大題目——「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而又爲我安上了我這幾年常用的筆名——「朱子家」。無可諱言，這題目在我來說是不夠莊重的。而且以我當時見聞的狹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會用這個包羅太廣的大題目。雖然我也曾受過有類於蠶室腐刑之痛，但我決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筆名寫實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頭露尾的誤會。然而一切既然已經決定了，在過去兩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筆下，盡力求其能做到「信」與「實」。

在連續寫作期內，因爲忙於筆債，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更以記憶力的減退，參攷資料

的全付缺如，事實上連一個大綱也竟然無從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完篇塞責，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見凌亂。又因爲我力求想做到信實，僅就我親見親聞的事實爲根據，每以孤陋，失之瑣碎。假如有一天我還能重回故土，將以我的餘年，搜集資料，重爲改寫，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這一本書，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將會愈增我的慚愧。

雖然和平以後，我有過太不幸的遭遇：籍沒、羈囚、以及一頂脫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沒有後悔，

因爲我明白本來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飄零第十週年

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目次

- (一) 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劇……………(一)
- (二) 一個似曾相識者的出現……………(三)
-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五)
- (四) 德大使調停失敗的秘聞……………(七)
- (五) 近衛三原則是怎樣來的……………(一三)
- (六) 汪精衛怎樣脫離了重慶……………(一六)
- (七) 河內高朗街的槍聲血痕……………(二一)
- (八) 香港成爲最早的發祥地……………(二四)
- (九) 我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二六)
- (一〇) 形勢迫得我作一個選擇……………(二九)
- (一一) 上海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三一)
- (一二) 七十六號中的丁李搭檔……………(三四)
- (一三) 在滬積極展開政治活動……………(三七)

(一四)	聖地亞哥	(四二)
(一五)	陳公博無奈一死酬知己	(四二)
(一六)	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四六)
(一七)	高宗武陶希聖何事叛離	(四九)
(一八)	公館派與CC間的暗潮	(五二)
(一九)	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組織	(五六)
(二〇)	鄭蘋如謀刺丁默邨顛末	(五八)
(二一)	如此這般的雙方特工戰	(六一)
(二二)	追悼會終於引開了殺戒	(六四)
(二三)	上海爲腥風血雨所籠罩	(六六)
(二四)	特工戰中申報首當其衝	(七〇)
(二五)	金華亭被殺是自取其咎	(七三)
(二六)	我逃過了五次危險關頭	(七六)
(二七)	日軍闕徘徊於和戰之間	(八〇)
(二八)	青島會談後三政權合流	(八四)
(二九)	吳佩孚汪精衛魚雁不絕	(八六)

- (三〇) 爲民族英雄乎爲漢奸乎……………(九一)
- (三一) 非驢非馬的青天白日旗……………(九四)
- (三二) 同舟胡越淒其一紙名單……………(九六)
- (三三) 千迴百轉中的人事安排……………(一〇三)
- (三四) 揭開了歷史悲劇的序幕……………(一〇八)
- (三五) 汪精衛兩行酸淚立階前……………(一一一)
- (三六) 六年中的財政經濟概貌……………(一一四)
- (三七) 法幣與中儲券兩度折換……………(一一七)
- (三八) 汪日經濟鬥爭又一回合……………(一二〇)
- (三九) 紗布收購後的三項去路……………(一二三)
- (四〇) 汪周間僅有一次的誤會……………(一二五)
- (四一) 周系十人組織暗潮初起……………(一二八)
- (四二) 三個人分成兩派的習性……………(一三一)
- (四三) 稅警團成爲內訌導火線……………(一三四)
- (四四) 關於清鄉的一幕爭奪戰……………(一三七)
- (四五) 我處身在內訌的夾縫中……………(一四〇)

- (四六) 李士羣是怎樣被毒死的……………(一四三)
- (四七) 隔室中傳來的一陣哭聲……………(一四六)
- (四八) 吳開先被捕與回渝內幕……………(一四九)
- (四九) 日憲兵救了蔣伯誠一命……………(一五二)
- (五〇) 保證人所負的兩項責任……………(一五五)
- (五一) 被汪親自所否決的提案……………(一五八)
- (五二) 陳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一六一)
- (五三) 南進北進所引起的揣測……………(一六三)
- (五四) 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內幕……………(一六七)
- (五五) 斷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一七二)
- (五六) 武裝抗日外的和平抗日……………(一七五)

(一) 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劇

我曾經目擊過一個政權的創建，以迄其沒落；而且我身親了這個政權的籌備、創建、發展，直到最後的消散。

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劇；朋友們的悲劇；也是中國歷史的悲劇！

到現在，事情已經過了十多年，過去的一切，也如塵、如夢、如煙般地逝去了。而曾經使我激動；使我憂傷；使我痛苦的往事，卻永遠牢繫在我心的深處。

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國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個大時代，而我剛剛生長在這一段不平凡的時間，而又身歷了其間一幕不平凡的悲劇。

每個中國人一定會記得一九三八年，中國對日抗戰，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戰局陷於極度困難與極度悲觀的時候。突然，一個會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攝政王幾權大辟有着半生光榮歷史的人物；一個曾經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時又是執政的國民黨的副領袖；一個會領導過抗戰的行政首長；而且還是號稱最高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的議長，他就是汪精衛！而他竟毅然脫離了中樞，由重慶，而昆明，而河內，而上海，而南京。在東南的一片廢墟上，在敵人槍刺下的佔領地區，樹起了與國民政府同一的旗幟，奉行同一的主義，採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稱；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絕對相反的另一政權！

遭一個惡報，自一九四九年三月
四個月又十二天的壽命，失敗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敗寇的原則下，一般人對之蓋棺論定：「汪政權的創建，是醜惡的活劇，其性質是被敵人驅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發生了疑問，像汪氏這樣的人，真會爲了利祿或者爲了意氣，甘心於出賣國家民族，以自毀其半生光榮的歷史嗎？這一羣被指爲國家的叛逆者們，當時做了些什麼？與想了些什麼？或許真如人們對他那樣地想像，但畢竟經過了五年多的一段時期，以及佔據有廣大地區的一個空間，歷史終將寫下這一頁。我不想爲自己辯護，爲朋友們洗刷，爲失敗的政權文飾。我願意憑了我的良知，就記憶中所留存的一點一滴，儘量忠實地，寫出身親目擊的真相，作爲後人的殷鑒與嘆息！

此自信應該有資格寫這一段沉痛的回憶，因爲在這是一個政權中，在黨，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階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點，我又參加了汪政權合柱周佛海的最機密部份。而在政權沒落以後，我又能躬與其盛，被籍沒了所有的財產，以漢奸罪判處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爲安慰與認爲德律的，是法院莊嚴的判決書中，竟然確認我有一「協助抗戰，有利人民」的事實和證據，「法外施仁」，竟邀末減，以徒刑兩年半的一紙判決書，代替了一枚勝利勳章。因此，讓我能終始其役，目親了這一幕不平

凡悲劇中許多重要脚色，當初怎樣忍淚登台，最後又怎樣從容赴死。從鑼鼓登場，直至曲終人渺。在寫出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認爲值得遺憾的，當一九四九年，又一個大時代來臨的時候，我深怕捲入了另一次漩渦，拋妻別子，倉皇南來，臨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書函、紀錄、照相、密件、報刊、都把它焚棄了。現在祇能純憑藉記憶來追寫。其中特別關於人名、時間等，相信一定會發生很多錯誤。同時，我也不否認人總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觀，也會有恩怨，雖然我將儘量不向壁虛構

，不顛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讀者們的指教、糾正和原諒。

(二) 一個似曾相識者的出現

一九三八年冬天，上海四周的砲聲，早已趨於沉寂。而租界裏卻呈現着一片畸形的繁榮，市民們驚魂初定，轉而就於逸樂。也有人于悵惘中看到咫尺之間的南市、閘北、浦東，敵人鐵騎縱橫，奸淫燒殺，漢奸們所組織的維持會更助桀為虐。同胞們的血淚洒遍了各處，但祖國離他們卻一步一步地遙遠。對抗戰的最後勝利，每個人雖然仍抱着殷切的期望，但誰也不敢預料抗戰將再經過多少的時候，與將在怎樣狀態下取得勝利。淪陷區民衆的心理是複雜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市民們感到驚愕。前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忽然從重慶出走，抵達了越南的河內，而且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了艷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即所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近衛三原則」。這一個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紛紛猜測。而接着，上海各報又接到了中央對汪的行動暫時不許攻擊的通令。於是，在無法獲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們相信蔣汪之間是在玩着一面抗戰一面談和的雙簧。這傳言是够厲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亂者之一。做久了記者的我，窺探秘密的好奇心，已養成習慣，但是，當時在淪陷了的上海，卻怎樣也無法證實這一項傳說的真偽。

幾個月過去了，汪精衛已經由河內到達上海，中央且已通過了對汪開除黨籍的決議，汪的言行也

一天一天趨於明朗，汪派的中華日報，且已在滬復刊，兩人們心裏「白雲飛渡」。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個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園三樓午飯，當飯畢行經二樓時，新聞界的舊友葉如晉也正在進食，他起來向我招呼，旁邊還坐着一個白淨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點面熟，但我已完全記不起他是誰了，他也望着我，祇微微的一笑，他沒有開口，我就先走開了。隔了一天，如晉忽然同了那位似會相識的人到我家裏來，一開始就由他自我介紹說：「我是羅君強，恐怕你忘記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長時，我是他的主任秘書，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園的公館，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還和我打過好幾次麻將？」我纔記起了確實有一個他。接着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周先生已隨汪先生來到了上海，現在暫時住在虹口江灣路，他說在漢口時曾經接到過你的去信，你說希望能轉至後方爲抗戰効力，他本想在中央宣傳部中，請你担任新聞處長一職，後來剛因戰局不利，政府退往重慶而作罷。今天他要我來看你，希望你能約定一個日期，和他談一次。」我被出於意外的談話所驚住，一時不知應當怎樣答覆。不錯，我與佛海之間，過去十年中存有相當的友誼。民十八，我正担任京報採訪主任一職時，奉派隨蔣先生北上赴平，在蔣先生的專車中，陳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業；孔祥熙、趙戴文（那時的內政部長）、熊式輝等因採訪關係，也早已認識。而當時隨節諸人中，不認識的還是很多。當專車開行以後，我們正聚在起居室中間談時，蔣先生從前一節車過來了，他問我同車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與他並不相識，這樣蔣先生爲我們介紹了，友誼也就這樣的開始。在北平的一週中，我們每天共遊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氣；也有書生的性格，因此談得很投機。以後回到了南京，我們來往得很密，而且他爲我在政治訓練處掛了一個上校秘書的名義，按月由他所主辦的新生命書店送給我一份乾薪。自政府

西撤以後，就僅僅通過幾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無可諱言希望能見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與蔣先生間關係之深，而此次竟會隨汪出走，這是政治上的一個謎，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脫口而出的說：「當然，我也希望與他談談，但是我不願意過橋（指外白渡橋）向敵軍除帽鞠躬。有負他的盛意，恐祇能期之於異日了。」君強說：「那容易辦，假如他到租界來時，再約你見面何如？」我不能推卻，事情也就這樣的決定了。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後，民國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個天低欲壓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葉如晉又匆匆而來，說汽車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來到滬西，在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專誠等我，希望能立刻去與他談一談。我什麼準備也沒有，就匆匆地隨着他上車，不到二十分鐘的行程，已經到達了那裏。極司斐爾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築路，馬路歸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兩側的房屋，則是華界的主權，滬西一帶那樣許多越界建築的道路，就是一個舉世所無的特殊狀態。

汽車到了門口，門外靜悄悄地什麼聲音也沒有，鐵門緊緊的關閉着，我仰頭一望，恍然於這原是前山東省政府主席陳雪暄（調元）的別墅。房屋建造得並不華麗精緻，但所佔據的地位卻相當廣大。就在抗戰前兩三年，陳雪暄曾在那裏為他的母親祝壽，那時賓客如雲，連天的盛大堂會，為上海稀有的場面，我曾經為那裏的賀客之一。不料幾年之後，陳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別墅，竟然成爲一幕歷

史悲劇的孕育之處。汽車的喇叭聲響了幾下，鐵門「由一乍」滾開了。且說明了要見的是什麼人，警衛室事前似已預先接到了通知，衛兵向車中注視了一下，大鐵門就呀然而啓。汽車緩緩前進，一個武裝衛兵立上了車外的踏腳板，指揮汽車在一條平廣的水泥路上，經過了第二道鐵門，直向一所廣廈駛去。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點中顯得模糊一片，但氣氛令人感到緊張。兩面的衛兵們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一身給黑色的雨衣雨帽連頭裹住，樣子像照片上看見的美國三K黨，手裏更持有長短的槍械，像隨時防備突然事變的發生。我情緒上有些不寧，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後悔。如晉看看我，我發覺他與我有同樣的感覺，我輕輕的問他：「你來過嗎？」他搖了一下頭，像陷入於沉思，默默地一聲不響。我們在對視中，車停止了，車邊的衛兵跳下來告訴屋前的另一衛士，開了車門，導引我們進入一間陳設簡陋的會客室。

兩分鐘以後，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現在我的面前，蓬鬆的頭髮，微帶蒼黑的皮膚，穿一件藍綢長衫，幾年不見，比從前豐腴了一些，但臉上顯出有疲勞的神態。他的外表不必恭維，他有讀書人的風格，至少他像一個樸實的中小學教員。從他的面貌以至與人晉接的態度來看，他絕對不像是一個政客。誰會想到他以一個窮學生，民十（一九二一年）還在日本西京帝國大學留學時期，已經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個代表之一，而且被選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其地位僅次於陳獨秀。後來佐蔣先生的戎幕，前後二十年中，儘管職務有過許多變動，自黃埔軍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離渝前的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為止，除了寧漢分裂一段時期他留在漢口外，其餘的時間，他都朝夕不離的隨侍在蔣先生的左右，有許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筆。而且是CC的最高幹部與黃埔系的指導階層。聞揚孫文學說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寫的「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為最權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態上，找不出一

絲這種氣息。我從民十八與他交游起，十年之中，祇覺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親切的談吐。現在立在我面前的他，已經成爲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卻依然如十年前初見時完全一樣。

(四) 德大使調停失敗的秘聞

佛海與我們熱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喟地說：「我想不到你竟然到這裏來看我，這是我到上海後第一個看到的故人了。」看樣子他也還是第一次來到這裏，目光向四周掃射了一下，發現後面牆壁上，還掛着當年他送給陳雪暄母親的一副湘綉壽聯，他停視了一下，又接着說：「短短幾年中，連這裏的情形也完全改變了！過去雪暄一切的陳設，已蕩然無存，而獨獨留着這一副我所送的壽聯，一飲一啄，豈不莫非前定？誰想到最後勝利的來臨之前，我會間關萬里的舊地重游，而又親見了當年我自己的舊物！」我不知應當如何答覆他言下的無窮感喟，我與如晉都以微笑來代替言辭。

他從回憶中猛然地醒過來，單刀直入說：「我叫君強找你的原因，我是隨了汪先生來創造一個局面，但隨我來的除了我太太與兩個孩子以外，祇有君強與惺華（楊惺華是他的內弟）。汪先生已決定如全面和平絕望，爲了拯救國家，將另行組府，還都南京。舊日的朋好，都在重慶，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憑了我們十年的交誼，這次非請你幫忙不可。」我夢想不到他竟會直截了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實地說：「雖然在友誼上，我希望能與你見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動，引起了外界的揣測，尤其你與汪先生向無淵源，何以會忽然合在一起？做慣了新聞記者的我，

項自由職業律師職務，業務還不錯，溫飽有餘以外，還足夠供我的掛號，使作此項工作。或許有你們的作用，但我以悠閒之身，無意於捲入爲國人所不諒的政治漩渦之內。」

「我不會讓你糊裏糊塗的參加，希望你靜靜地聽了我告訴你前後果之後，再作鄭重考慮。今天，我並不勉強你立時有一個決定。」說來真是話長了！他又嘆了一口氣，「國事不是兒戲，也不應當純憑一時的意氣。當年日本的步步進逼，遲早會有這一天的；但抗戰前夕的形勢，顯然還不宜輕於言戰。自從北伐以後的幾年中，國力都消耗於內戰，當時空軍未曾建立，軍備也遠不足與強大的日本爲敵，但是純潔的民衆與別有用心的黨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調，蔣先生是清楚知道這一點的，他既無法抑制當時激昂的民氣，又不能宣洩國家實力的秘密。抗戰固然無可避免，但不應當在準備未完成前，作冒險的嘗試。你也許知道當時政府高級人員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也會提出過審慎的意見。尤其我在南京西流灣的寓所中，許多比較知好的朋友，時常聚談有關國家興亡的當前局勢。如胡適、陶希聖、梅思平等，會就一般的實際問題，不時加以討論，加以分析，我們會經自稱之爲「低調俱樂部」。而七七事變之後，以日本的得寸進尺，國內民情洶洶之勢，終於無法挽救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頓了一下，又繼續着說：「在過去的一段戰爭過程中，日本顯然已有過兩次的錯誤。在開戰以前，日本過於低估了我們的實力，他真以爲三天可以佔領淞滬；三個月可以掃平全國。日軍打到南京，國軍在大潰退以後，顯然一時已喪失了鬥志，但日本以爲我國政府一定會屈服，祇願肆行屠殺，按兵不動。假如當時他們乘勝追擊，抗戰的能否持續，還是一個絕大的疑問。而日本犯了兩次重大的

錯誤，曠日費時，他們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們也有其不可終日之勢，但最後錯過了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這一個機會以後，雙方儘管都已筋疲力盡，事實上還必須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爲中日調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來了日本讓和基本條件七項，大體是這樣的：日本答應分期撤兵，與放棄賠償。華北一帶，恢復七七事變前何梅協定的原狀，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認『滿洲國』。我們接到了上項條件以後，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漢口中國銀行，召集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在會議中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終於正式通過了有條件的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當時蔣先生正在鄭州部署軍事，國防會議推孔庸之（祥熙）代表向蔣先生報告，以作最後決定。」

「會議以後，孔庸之就在電話中，就陶德曼轉來日本條件的內容，國防最高會議中委員們個別的意見，以及最後的決議，向蔣先生詳述了一遍，請其裁決。蔣先生當時的意思是：除了承認『偽滿』以外，日本的條件不能算太苛，他說：「如此，日本又何必輕啓釁端？可照國防會議的決定，依外交途徑去進行。」通話本已告一段落，而蔣先生忽又說還是把全部文件送給他，讓他再作一度的考慮。電話就這樣結束。而雙方卻因匆匆通話，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後答覆的期限，竟然沒有報告蔣先生。那時日本內閣首相林銑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組，復由近衛文麿組閣，廣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議和基本條件七項，廣田本限年終答覆，後經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之要求，始允延長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漢口方面自孔庸之與蔣先生通話後，立派專人把有關陶德曼調停的重要文件，送給蔣先生。專人到達鄭州時，蔣先生已轉赴洛陽，再追蹤到洛陽，時間畢竟已有些就誤了。蔣先生最後的指示，仍